

西班牙悬疑片《看不见的客人》设了一个好看的局——

拍案惊奇后,这部电影还有什么

■本报首席记者 柳青

最近上映的影片《看不见的客人》在社交网络上维持着很高的评分。这部在国内影院难得一见的西班牙电影,在上海国际电影节期间放映时是一匹黑马。公映后,它在票务网站上的得分高于同一个档期的《蜘蛛侠:英雄归来》《猩球崛起3:终极之战》和《敦刻尔克》。

电影胜在严密的编剧思路和内在自洽的逻辑

《看不见的客人》有着显而易见的优点:严密的编剧思路和内在自洽的逻辑。

影片本身的内容不复杂。年轻富豪艾德里安和情人劳拉幽会回城的路上,意外发生车祸,重伤了一个驾车从对面驶来的年轻人。艾德里安担心警察介入车祸后,他的婚外情丑闻将曝光,于是做了一个愚蠢且残忍的决定——把原本有希望被救活的年轻人和他的车一起投入湖底。艾德里安和劳拉各自回到“生活正轨”,然而劳拉内心难安,患上焦虑症,最终向年轻人的父母坦白车祸真相。她希望艾德里安说出沉尸地点,并拿出一笔巨款补偿那对失去独子的老夫妻,却反被灭口。老夫妻明白,艾德里安和他的律师能用金钱收买证人、伪造证据、最终逍遥法外,两个绝望的老人在周密计划后设下一个局,从艾德里安嘴里“套”出了真相和罪证。整个故事的核心是钱有权有势的人如何为了一个谎言用更多的谎言和罪过去掩盖,而手无寸铁的弱者像大卫战胜歌利亚那样绝地反击。

编剧出身的导演为这个本质很简单,故事设计了一个复杂的框架。故事讲述的时序被打散,以男主角涉嫌杀死



《看不见的客人》故事本身内容不复杂,但编剧出身的导演为这个本质很简单,故事设计了一个复杂的框架。图为电影海报。

情人作为开场,以一个辩护律师在开庭前和当事人“核对证词”为主线,借用《罗生门》的结构,从一桩疑点重重的“情杀案”,牵扯出另一桩“年轻人离奇失踪案”,看不见的蛛丝马迹勾连着两桩看似全无关系的案件。在律师对当事人一次又一次的“诱导”中,反转一次次上演,“假设”被推翻,谎言被拆穿,细节逐渐拼凑完整,直到穷凶见。在这个过程中,事件的讲述方式覆盖了事件本身。电影里真正意义上的戏剧场景只有一个,就是男主角的家里,他和律师见面的书房,一个被警方严密监控的空间。但是电影的大部分时间是离开这个房间的,不断的闪回、假设、谎言、推测和“有关过去的真相”混杂在一起,真假假,构成了影片所为人称道的“43次剧情反转”。

在接连不断的反转中,情节变得次要了,观影过程成了类似刑侦推理的头脑风暴。或者就像导演形容的,

这是一场玩纸牌的游戏,观众和电影之间一如男主角和代理律师之间的关系,一次甩出一点牌面,彼此之间不断试探对方的底牌,等待着那张终结一切的王牌的出现。这位新锐的欧洲悬疑片导演很明确地说过,《看不见的客人》从一开始就要激发观众的破案心理,跟着电影去解决问题,在这里,电影成了一列高速行驶的火车,越开越快,直到载着观众冲向真相。

这也就不奇怪,很多观众观影后,会热衷于交流“我在什么时候猜到了真相”。

如果它能放下自以为聪明绝顶的故事框架,也许会更有趣些

可是,如果把“烧脑”当作评价电影的终极标准,这是不是对“电影”这种媒介有误会?换个婉转的说法,如果你是

个倒霉的观众,在进影院前被剧透了精光——从一开始,你就知道凶手是艾德里安,知道律师的身份秘密,知道那对绝地反击的老夫妻设了一个“诱供真相”的局——那么,作为一个“知情太多的观众”,这部电影还能带来惊喜么?在悬疑制造的最直观的“惊愕”之外,这部电影还剩下什么?

悬疑电影大抵可以分成两类,第一类在“真相”揭示以后,电影本身的魅力就大规模地减损了;第二类则是观众哪怕熟悉影片里的每一句台词、每一个细节,依然在重看时被卷入剧中人的命运中——“侦探波洛”系列里的《东方快车谋杀案》《尼罗河上的惨案》,以及几乎全部的希区柯克作品,都属此类。而《看不见的客人》很准归到这一类里,导演在创作中强调智力和逻辑的对决,可是,对比于结构设计的匠心和匠气,这部电影在戏剧营造的层面是粗糙的。在回忆、假设和谎言交织的闪回段落中,创作者着力于构建“甄别真相”的游戏感,并未建立起真正有效的戏剧情境,在高概念的布局设计压力下,人与人之间以及人物个体内心的戏剧力量其实没有机会展开。

电影的最后,男主角站在窗边看到对面公寓楼里的老人,这个瞬间让人联想到《后窗》的经典场景。但是在《后窗》里,寻找真相从来不是第一重要的。从一开始,希区柯克就透了底,比起“侦破”的乐趣,他电影里生动盎然的是那些孤独、古怪、偏执又痛苦挣扎的个体,是人与人之间既亲密又伤害的怪异关系。在任何凶案前,扑朔迷离的“人与人之谜”才是永恒的悬疑。至于《看不见的客人》,如果它能放下自以为聪明绝顶的故事框架,全部电影只围绕一个场景:律师和当事人共处一室的交锋,让镜头始终停留在这间密室里,也许,它会更加有趣些。

第一届国际机器人艺术节在意大利比萨举行,机器人“指挥家”引发关注

挥舞指挥棒的机器人只能证明在音乐中最重要的是人的情感

■本报见习记者 王筱丽

尽管世界“第四大男高音”安德烈·波切利高亢的歌声足以冲破意大利比萨的威尔第歌剧院,但众人的焦点显然集中在了他身边的“指挥家”——瑞士科技公司的双臂机器人 YuMi。这场于不久前举行的别开生面的音乐会,是第一届国际机器人艺术节的终场演出,在意大利男高音歌唱家安德烈·波切利与卢卡爱乐乐团合作《善变的女人》一曲时,机器人 YuMi 担任了指挥一角。

人类花了 17 小时,教会机器人指挥一支六分钟的曲子

双臂机器人 YuMi 诞生于 2015 年,是全球首款真正实现人机协作的双臂机器人。卢卡爱乐乐团指挥安德烈·科隆比尼以“示范编程”手把手调教了机器人,他握着机器人的手臂进行引导,随后机器人便能记住这些动作并在演出中进行重复。为了能让机器人顺利登台,短短六分钟的曲目,科隆比尼用了整整 17 个小时才教会了 YuMi 整套指挥动作。

事实上,机器人指挥已不是新鲜事。早在 2008 年,日本机器人 Asimo 就曾指挥过底特律交响乐团,九年后过去,YuMi 显然比 Asimo 进步了不少。Asimo 只能做出极其有限的上下和单臂动作,但 YuMi 的双臂几乎跟人类一样灵活,并借助于最新软件为其设计的微调动作,YuMi 的“指挥能力”已经上了一个台阶。

YuMi 的设计起初只是为了满足消费电子产品行业对柔性生产和灵活制造的需求。然而,如今机器人已不满足于仅在工业领域大展身手。此次化身指挥家前,YuMi 其实早就开始了“多栖发展”:化身 DJ,打碟玩摇滚;在象棋比赛里,为选手摆棋;为顾客泡咖啡,还拉得一手好花。

机器人音乐家们准确但“无情”,最合适的岗位是指挥助理

在演出结束后,科隆比尼用“还不赖”评价了 YuMi 当晚的表现,“一切都在预想中,没有发生什么意外。”不过,机器人指挥的弱点也是显而易见的,“机器人无法取代人类指挥的敏感性和情感,因为机器人没有灵魂,它只是一



男高音歌唱家安德烈·波切利与卢卡爱乐乐团演绎《善变的女人》一曲时,机器人 YuMi 担当指挥一角,抢走了波切利不少风头。

支手臂,不是大脑,不是心脏。”

机器人无法掌握人类指挥家的核心——对于音乐的敏感性,随着音动而动,随着乐感而感。虽然 YuMi 在演出中没有出现差错,但这同时也意味着任何突发的状况都是不被允许的。乐队不能改变节奏,因为机器人无法即兴发挥;歌唱家们亦步亦趋地跟着机器人的节奏,生怕错过了一个拍子;一切事先未被编入程序的欢快乐段和渐慢乐段都会毁了整首歌曲。指挥家和乐团之间互动的火花消失了,各乐器部门之间心有灵犀的配合不见了,音乐的敏感性和偶然性因为死板的程序而荡然无存。机器人使用它的手臂,但灵魂和精神终究来自于人类。

“从现在的技术条件来看,机器人指挥家只是充当了‘高级节拍器’的角色。”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工程系副教授刘灏这样对记者表示。在他看来,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尝试,但与此同时,机器人能够完全代替人类指挥的可能性非常小。指挥并不只是简单的节奏控制,每个指挥家都有其特定的手势,对乐曲快慢的掌握,对每一个和声的情感理解,这些都是机器人难以企及的。据刘灏透露,上音目前也会使用“算法作曲”,通过公式对音频进行剪辑等工作。“但这类程序还是依附在人类的情感和乐感之上,我们借助机器人表现音乐,但它们终究只是可控的辅助手段而已。”

在此之前,诞生于意大利的钢琴机器人“泰奥”就曾引发过“机器人抢人类饭碗”的热烈讨论。53 指机器人泰奥与意大利钢琴家罗伯特·普罗赛进行过一场“人机大战”。“我是世界上最棒的机器人钢琴家,一个音符也不会弹错的我比任何一个人人类钢琴家都厉害。”机器人泰奥对罗伯特立下这样的“狂言”,并号称能演奏人类钢琴

快评

新媒体时代,什么是粉丝与偶像的理想关系

——从少年偶像团体 TFboys 各自成立个人工作室说起

寒江

在商业利益的裹挟下,在一切以数据为先导的商业模式下,粉丝占据了越来越多的主动权,以致明星和经纪团队也不得不把满足粉丝的意愿视为工作的重点,以期实现“短期套利”

不出所料,几天前,当人气颇旺的少年偶像团体 TFboys 三名成员各自成立个人工作室,三人的粉丝们都表示“喜大普奔”。这些年来,TFboys 各自粉丝团之间的剑拔弩张,实在堪称“现象级”,甚至衍生出了知乎网站上的经典话题:“为什么其他明星的粉丝喜欢和别家撕,TFboys 的粉丝喜欢自己撕?”

但说到“粉丝”和“撕”又有些困惑。从何时起,带有攻击意味的“撕”竟成了粉丝的重要职能?粉丝们坚定地站在偶像一方,不遗余力地捍卫着偶像,怒撕偶像的竞争者、挑战者,怒撕偶像戏里的搭档,怒撕偶像戏外的绯闻对象,怒撕偶像的经纪人、工作团队,甚至还有直接撕偶像的,用“一言不合就开撕”来形容某些粉丝团体的行为似乎也并不为过。这“撕”文化究竟是何方神圣?

追溯起来,“撕”还得从粉丝的“应援文化”谈起。“应援”本为声援、助威之意,原是指体育比赛中整齐划一助威行为。相信看过日韩体育赛事的观众对此都不陌生。而当应援活动与日韩娱乐业一经结合,便爆发出了遮天蔽日的惊人力量。比如在演唱会现场,粉丝成为了偶像演出的一部分,尽情展示着自己的体验感和参与感,相同的手势、一致的跟唱,用颇有技巧的呼喊营造气氛,将偶像的演唱会变成了粉丝的主场,台上的偶像也多予以回应配合,共同打造上山呼海啸、波澜壮阔的现场效果。而在场外,粉丝的花式应援同样让人目不暇接,以支持偶像的名义送食物、送礼物、做慈善,主动策划各种宣传推广活动,粉丝以应援的方式跻身到了偶像的商业运营中,数量庞大、高度组织化的粉丝群体购买专属的应援物品、购买周边商品、接机送机、追看演唱会、为偶像拉票,甚至将偶像的名字推上了纽约时代广场的广告栏,其巨大的组织能力和消费能力直接反应了偶像的商业价值,也成为了明星人气指数的风向标。

可以说,在后娱乐工业时代,粉丝已不仅仅是明星模式的消费者,更是明星生产机制的制作者、促成者。这在选秀明星、流量明星的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与以往“超女”“快男”时期单纯追随偶像足迹的粉丝不同,应援文化下的粉丝团体本身就在建构着偶像的商业价值,使其从名不见经传的偶像,经由双向互动,最终晋级为超级巨星,这种追星带来的成就远远非买张 CD、看场演唱会所能及。因此这种追星模式也被称为“明星养成游戏”。作为脱胎于日本女子偶像团体 AKB48 的中国本土化偶像组合,SNH48 同样采取了“可面对偶像”的运营理念,让粉丝全程参与到偶像的成长过程中,进行公演,也通过举办握手会、年度成员总选举等营销手法提高作品销量。

然而,在总体商业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同一团体中各成员间的排名之争、冠军亚军之争都已然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其中,“唯饭”粉的表现最为抢眼。

莫迪亚诺继续书写“记忆迷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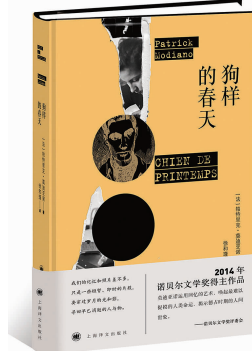
《狗样的春天》《废墟的花朵》最近引进出版

■本报记者 许畅

曾有文学评论家半开玩笑地说,法国作家、诺奖得主莫迪亚诺,一直在写“同一本书”——他笔下的主题与题材似乎总绕不过对逝去记忆的追踪。最近,莫迪亚诺《狗样的春天》和《废墟的花朵》由上海译文出版社首次引进国内,同样延续了贯的风格:在巴黎的大街小巷,找寻模糊的记忆和消逝的青春。

法国曾在 2013 年出版《莫迪亚诺 10 本合集》,专门收录了《狗样的春天》。莫迪亚诺对此表示:“这 10 本书首次作为合集出版,可以把它们看作是我的所有作品的‘脊椎’。”《狗样的春天》的译者徐和瑾,以翻译作家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而为读者熟知,《狗样的春天》是他去世前留下的最后几部译作之一;《废墟的花朵》则由傅雷翻译奖得主胡小跃操刀翻译。

莫迪亚诺笔下的巴黎是神奇的,人们能在街的尽头遭遇奇遇,从蒙马特到西岱岛,到香榭丽舍,到圣日耳曼大道……普鲁斯特在 100 年前用了毕生精力完成了七卷本《追忆似水年华》,莫迪亚诺则用他所有的作品谱写了一段关于巴黎、关于 20 世纪四五十年代的似水年华。不过,相较于普鲁斯特,莫迪亚诺的小说还受到了侦探悬疑大师乔治·西默农的影响,身份成谜的故友,暗影憧憧的别墅,巴黎这偌大的城市能藏下千千万万人的小秘密,就像《废墟的花朵》,一桩时隔多年的谋杀案引起了小说主人公的兴趣,他想要找到那些已经被时间模



《狗样的春天》首次引进国内。(出版社供图)

糊的姓名和背影,如同拼图般拼凑出当年的真相,但随着调查展开,更多的疑问却层出不穷。

《狗样的春天》和传奇战地摄影师罗伯特·卡帕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1964 年春天,“我”认识了摄影师冉森——罗伯特·卡帕的朋友。两人有过短暂的友谊后,他突然失踪了,有人说他去了墨西哥,带着所有的照片,没有留下一点存在过的痕迹。30 年后,偶然发现的一张照片又勾连起那些尘封的往事。

记者获悉,《狗样的春天》和《废墟的花朵》的封面设计灵感,正来自《狗样的春天》中的一句话:“我们的记忆和照片差不多,只是一些短暂、即时的片段。”脱下书籍护封,两本书的内壳以黑色为底,分别采用了印金和印银技术来印刷手绘人像,恰恰如同一张久远的胶卷底片。护封上的黑白老照片处理成撕开的效果,犹如记忆的层层叠叠,需要像老照片一样一层层剥开。